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六二 ——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12a)

---

【运动记愧】怯弱的良知——我的1966年8月	田小野
【史海钩沉】周恩来最后六个月做了哪些事？	王永钦
【千秋功罪】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动力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运动记愧】

怯弱的良知——我的1966年8月

• 田小野 •

(一)

1966年8月，我是北京女一中的初三学生，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在家庭问题上，我们这类人的出路就是“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就是要在一夜之间，拒绝支撑了十几年生命的亲情，将爱转化为恨，这无疑是一种强迫，但当时的我，是努力而痛苦的将“强迫”转化为“自愿”的。因为“划不清界限”本身，就意味着被划出革命的圈子，而“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是我别无选择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最讲血亲关系的：“亲亲，仁也。”（《孟子》）。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使子女摆脱了“长者本位”伦理观的约束，获得独立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但鲁迅再三强调不能因此而否定“人伦”的“天性的爱”，因为它是人世间“隔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爱”！——这是一条“底线”！如果除了作出不同于父辈的选择，还要视父辈为仇敌，伤害自己的亲人，那就过了“线”！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主张，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爱是“隔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是绝对的！是同样不能让步的！这是一条人兽之界，过了这条界限，人就不成其为人！人内在的兽性

一旦被如此彻底的诱发出来，可以任意的伤害自己的亲人、骨肉，那末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不出来？！

我们一代人文革前就懵懵懂懂、耳濡目染的受着这样“划清界限”的教育，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周总理为革命事业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再到“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等等，连遇罗克这样的先哲都曾不懈的与其家庭作斗争。而“红八月”在中学，真正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主题歌。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是一个危险的让步！一旦开了头就会身不由己，按照这个逻辑，顺流而下，会引出各种可怕的行为。这里也隐含着一种道德观、伦理观，即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所谓“崇高”，不过是自欺欺人！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干，什么人都可以背叛、伤害，如此为一切反人性行为开路的伦理哲学，在我们的教育中，曾经打着“革命”的旗号风行一时，至今仍然有影响。……

当时我虽然不是红卫兵，但是每天都要去学校，学毛主席指示，看大字报、参加斗争会。我们教室的前方有一个施工的水泥坑，学校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张乃一被斗争了之后就常常在那坑里，她浑身上下浸透了深灰色的湿水泥，头发、鼻子、嘴、眉毛都看不见，只剩了一对幽幽的目光，像一个古怪的灰色精灵。有的时候高中的红卫兵来对她训话，有的时候初中的红卫兵，抡着皮带抽打她，她发出一声声的惨叫，当抽打声实在不堪忍受时，坐在教室里的我有过冲动——喊一声：“别打了！”或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什么的！但这一闪念即刻被一种畏惧甚至是恐惧压灭了。在那个“红色恐怖万岁”的八月里，此类内心活动不只一次的反反复复。我曾是个任性而好冲动的孩子，幼儿园时就好打抱不平，敢当众和老师顶嘴（哈！兔贝贝至今记忆犹新），小学时喜欢和男孩子一起舞枪弄棒、爬树上房，8岁时因为受不了委屈，从住宿的学校趁天黑出逃，步行几个小时才找到家。虽然是女孩子，但我一直被家人戏称为“拼命三郎”。可是，在我未满16岁那年的红八月里，支撑在我生命中的一棵挺拔的小树，突然被拦腰折断了！怯弱！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怯弱的人！

即使变得怯弱，今天我也还庆幸自己没当成耀武扬威的红卫兵，没作出更愚蠢和疯狂的事情！这里我想引丁东《精神的流浪》中的一句话来说明：“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 （二）

我们班开始斗同学了！被斗的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赵留柱，下中农出身。北京女一中与中南海一墙之隔，干部子弟集中，高干子弟较多，我记得初二时学校开始着力培育干部子弟的优越感，班主任在班里召开干部子弟的秘密会议，内容是要干部子弟努力学习，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红专”的接班人，出身不好的同学学习好就是“白专”，我们的党要保卫红色的江山永不变色。一些学习纪律差的干部子弟在这样的秘密会议上获得激励和优越感。后来的文化革命，我看到，无论是在水泥坑抽打校长的还是在我们班主任老师背上钉图钉的，都无一例外是校长老师们亲手培育起来的不可一世的干部子弟。

赵留柱不是干部子弟而窃据了班里团支部书记的职位，红卫兵中的团员和非团员都对此愤恨不已。这是文革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斗争会（以前我参加的所有斗争会都是操场或广场的大会，我都是离得远远的观看，而这次的斗争对象就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就坐在自己身旁突然被揪斗）！……全班同学把她围在中间，有人指斥她，有人推她、踢她、打她，向她身上吐唾沫，她圆圆的红脸变得惨白，两根粗粗的麻花辫子披散开了，她下意识的用头发把脸尽量

遮挡住！但她始终没有哭！……

我至今不相信当时全班同学都认为她应该被斗，但这样的发生在40多个女同学之中的事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她说句话！包括我自己！这是我多少年来不愿意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后来我问过一个同学，她说：“你想的太多了，这种事无论应不应该它都发生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好自己。”……

赵留柱后来到山西插队嫁作农家妇，至今未回北京。我1995年约她写了篇农村生活的回忆文章《人生路弯弯》，收在我们编的《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里》，在这本书的作者里，她是唯一的留在当地的北京女知青。1995年她从山西回北京交稿时，我召集了一个全班同学的聚会，希望大家能在近30年后向她说声“对不起”，但是谁都没说！我也没有机会说！

去年春节，赵留柱来京探亲和另一个同学到我家，我准备这次一定要说“对不起”了，我刚提起个话头，她就打断我说“我不想再提那些事”！另一个同学赶忙对我使眼色、摆手，……我终于没能当面向赵留柱说一句“对不起”，因为她不想听！

### （三）

1966年的8月里，我和王思不知怎的到一起了。在学校时，我们相互不讲话，出了校门她就跟在我后面回我家，我的爸爸妈妈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虽然家里到处都贴着封条，毕竟没有大人在家，少些拘束。我们从这屋窜到那屋，又从那屋窜到那屋，像两只热锅上的蚂蚁！热！我们就在屋子中间的地上铺上张大席子，躺在地上，还热！我们就去什刹海游泳。……

那天王思没到学校，我在学校里一个上午都没人理我，下午我就去王思家找她。王思的妈妈卞仲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思初二时从女八中转来，初三就当上了班长。

她家是礼士路楼群中的一套三居室，楼道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满目“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家门大敞着，门外站满了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们许多人站在高高低低的楼梯上，一个站在高处的女生正慷慨陈辞。我进屋找到王思，她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她妈妈还没有回家。就是说，人还在学校里挨斗，而一部分红卫兵已经在家门口准备继续的斗争了。门口的喊话内容是要他们子女与其母亲“划清界限”。我和王思，还有她弟弟、妹妹，躲在最里边的一间屋里，谁也不说一句话，她的妹妹跪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呆呆的望着窗外。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门口传来骚动声，王思紧张的对我说：“我妈妈回来了！”果然，“打倒卞仲耘！”的口号声震天响。王思的妈妈卞仲耘到卫生间去洗了，红卫兵不让关门，说要防止自杀，王思的妹妹在卫生间里陪着她妈妈洗，我们站在卫生间外面，门口的批判斗争似乎在不断升级，人也似乎越聚越多！……我突然对王思说：“我想回家！你和我一起去我家吧！”王思无言的对我摇摇头。哦，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里有她的弟弟妹妹！还有她的妈妈！

我走了！那天我在王思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直这样以为）走了！因为我害怕！第二天下午，听说王思的妈妈死在师大女附中的操场上。

……

### （四）

呜呼！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是的，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清醒的反省、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再不能阿 Q 式的始终“自我感觉良好”了，这不能不使我常常想起鲁迅说过的话：“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

但是鲁迅又指出“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为了生存，我们有时不得不以限制（非放弃）“说”的自由作为代价。

鲁迅笔下的涓生（《伤逝》）就是如此：当他明确意识到自己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时，他就面临着“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不说”即是说谎，安于虚伪，不免是沉重的空虚；但“说”出真实，不仅意味着要面对绝望，还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别人，让子君在威严和冷眼中，孤独的走所谓人生的路，并导致最后的死亡！“说”，涓生同样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价！

也许，“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将是始终折磨着我们的人生困境。

.....

~~~~~  
【史海钩沉】

周恩来最后六个月做了哪些事？

• 王永钦 •

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依然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6月2日，就赵君陶关于其姐赵世兰政治历史问题的申述信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赵世兰所作结论进行复查。

6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威尔西和夫人。翌日，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他的夫人、女儿及其他随行人员。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见。周恩来说，中菲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当马科斯称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当然领袖”时，周恩来说，第三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大家庭，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当这个头头。又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我本应该举行一个家宴，请你们全家，请我们的老朋友罗慕洛（菲外交部长）先生吃顿饭的，但现在没有可能了。9日，周恩来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6月9日下午，参加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这一天，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贺龙同志骨

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6月16日，就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这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还说：“我现在身体还禁（经）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当晚至次日凌晨，做手术治疗。仅一周后，又开始接见外国来宾，同有关负责人谈话，审阅报告并作批示。

7月23日，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嘱咐工作人员对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见厅，周恩来伫立“迎客松”画前，沉思良久。

8月24日，经过二次治疗，他的身体仍很虚弱。在北海公园散步时，他长时间凝望湖水沉思，并对身边医务人员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8月26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周恩来热情地赞扬邓小平，给两位亲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场的柬埔寨民主团结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回忆说：周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所取得的显着成效，周恩来感到由衷的欣慰。这种欣慰之情，在他以后同外宾的多次谈话中也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

在周恩来住院期间，邓小平是他在医院里会见次数最多的中央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期间，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次数更频繁。经毛泽东同意，从7月初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从此，周恩来和邓小平每隔几天就要见一次面。单在7、8、9三个月，他们在一起开会或谈话就有12次，几乎每周一次。此外，周恩来经常约见的政治局成员还有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华国锋、汪东兴等。

8月29日，周恩来同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谈话，请华转达他对西藏人民的问候，并提出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培养藏族干部，发展民族经济。他紧握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进入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不得不取消周恩来的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

9月3日，他同秘书一起清理文件，吩咐秘书，除“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关材料和1972年江青会见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谈话等有关材料外，其余材料均退回有关部门。

9月4日，他就3日《参考消息》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作出批示，要罗青长、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批语最后，周恩来用颤抖的手一连写下了4个“托”字。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当谈到自己的病情时，他坦然而又肯定地告诉客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

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这次会见，只有短短的15分钟

9月15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开展对《水浒》评论一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为此，在做手术之前，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在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第二件事是，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老战友邓小平。在进入手术室的前一刻，躺在推车上的周恩来示意停下，轻声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刻跨步上前，靠近推车。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的话，一方面是对邓小平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鼓励他继续大胆地干下去；一方面警告张春桥一伙人：我和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支持邓小平的，你们想打倒他，党和人民是绝不会饶恕你们的！第三件事是，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遭受“四人帮”诬蔑时的严正态度。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对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来说，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但他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只能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9月28日，在病床上的周恩来，接见前往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请他们转达他对新疆各族人民的问候。

这一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0周年。在邓小平等支持下，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冲破江青一伙阻挠，在10月中旬重新演出由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当长征组歌重新演出后不久，邓颖超即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总理在医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听一听长征组歌。不久他收到了长征组歌的录音带。长征组歌，特别是那首《过雪山草地》，是周恩来十分爱听爱唱的一首歌曲：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这首颂扬红军英雄气概和顽强斗志的歌曲，仿佛又一次把周恩来带回过去那艰难困苦岁月，成为鼓舞他坚持工作、忘却病痛和劳累的巨大力量。

一再叮嘱邓颖超：死后不要保留骨灰。他对身边医务人员说：“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在周恩来住院期间，他的妻子邓颖超经常守候在丈夫身边，从精神上给周恩来更多的关怀和慰藉。在充分估计到自己的“时间不长了”的时刻，对于“后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和邓颖超共同商量的话题。在他去世一周后，邓颖超在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以及亲属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忆：“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

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在广州结婚，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堪称一对模范夫妻。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之间该有多少要说的话啊！可是，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如何为人民、为后代造福。至于他们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其他“心里话”，始终没有讲起。邓颖超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他们一生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病重期间，每当剧痛袭来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不露痛苦的表情，并安慰和鼓励他们：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可以很好地在身上总结经验。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受癌症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总有一天会突破的！

到了1975年秋天，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新的发展，即由原来的“移行上皮细胞癌”转为“鳞状细胞癌”之后，恶性程度更高了，并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继而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他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已开始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及茶水。从11月下旬起，他身体已十分虚弱，连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没有力气，要依靠别人将他身体托起把便盆塞进身体下面去才行。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由鼻饲管通过“蠕动泵”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质不能往下运转，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得改为每天静脉输入抗菌素治疗药物，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使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与次数明显增加。进而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脏和肾脏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治疗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

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肆虐。它们每时每刻在吞噬着周恩来的五脏六腑、骨骼与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镇静药物和止痛药品几乎已失去了作用；满脸胡茬，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痛。那双令敌人望而丧胆、使同志倍感亲切的眼睛已不再炯炯有神。他的体力非常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声音轻微，生命处在垂危之中。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周恩来生前一直主管台湾工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个问题，一直在他心中占有十分重

要的位置，就是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也不例外。

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体温达到38.7℃。这时应约来谈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来到周恩来的床前。周恩来非常吃力地向罗青长询问台湾近况以及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情况，并且嘱咐道：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不到15分钟的谈话，周恩来竟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进入昏迷状态。

到12月底，病危中的周恩来因为长时间没有理发，他的容貌已完全变了：花白的头发蓬长，胡须几乎把嘴唇遮住，灰黄的面部布满一块块的老年斑，深陷的眼窝发黑，双目更不见原有的神韵和风采。过去一直为周恩来理发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托人捎信请求给总理理发。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朱师傅给我理发20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谢谢他了。

病危之际，周恩来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以及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和下落表示关切。

病危之际，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央领导权问题。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周恩来虽然已有两个多月不能进食，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液体，还有留下的少许残渣，加之体内恶性肿瘤细胞和各类致病菌在迅速地生长繁殖，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而产生毒素。这些复杂而有害的物质造成肠道发生麻痹，本已处在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增加了“肠麻痹”，使得他腹部胀满，疼痛难耐。

为此，在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做“结肠造？术”，就是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毫无效果。随后，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等陆续来到医院。

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8岁。

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陷入无比的沉痛之中。他们冲破“四人帮”的种种禁令，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深切缅怀周恩来的悲壮气氛同对“四人帮”的憎恶情绪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的逝世使全世界为之震动。130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悼念，对周恩来为中国、为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作出崇高的评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由会议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为周恩来默哀。联合国大厦下半旗致哀。

1月15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几千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遵照周恩来的遗愿，15日至次日凌晨，周恩来的骨灰由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乘飞机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周恩来走了，骨灰撒向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他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一个经受并战胜无数磨难的伟人，永远矗立在亿万人民的心里。

1988年春天，中南海西花厅院里的海棠花又盛开了。这是周恩来最喜爱的花。84岁的邓颖超深情地回忆起12年前离去的周恩来：你不在，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你，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人民并肩战斗。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

~~~~~

## 【千秋功罪】

### 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 • 动 力 •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中国近代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周是早期中共领袖和中共军队创始人。毛带领全党打下江山，是中共的开国皇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两人都曾经是同志、战友、对手和君臣。他们之间关系复杂、恩怨交织，几十年纠缠不清，中共官方对此讳莫如深，竭力掩盖。海内外的历史学者和研究人员也是各执一词，众说纷纭。使历史的真相扑朔迷离，晦暗不明。近期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引起大家对这俩人的关注。我想谈一些个人想法，与大家讨论。我将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谈我的观点。

#### （一）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复杂，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1928年—1936年）1925年周恩来从苏联归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广东军事部长，培养中共军事干部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他与陈延年、杨殷都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培养的军事领袖。后来领导南昌起义，建立中共军队。1928年4月参加中央核心领导集团，成为政治局常委。从李立三、瞿秋白直到王明路线时期周恩来都是中共中央实际掌权者。毛泽东是井冈山和江西根据地的开创者，是地方实力派，是土共。毛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有深刻了解，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所主张的东西与苏联革命路线相去甚远。他农民背景，他游击流寇似的作风决定了他不是一个苏联要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

战士”。共产国际对毛这种人是排斥和不信任的。周恩来是苏联在中共党内的“代表”，共产国际的看法决定了他对毛的态度。毛桀骜不驯，他有他的法宝，不会对洋人唯命是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与中共中央里那些苏联的追随者们是格格不入，要发生冲突的。早年朱德、陈毅也是仗上海中央的支持（还是周吧）把毛泽东赶出红四军。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也是受周指派到瑞金去斗争毛的。制止他滥杀“AB团”。周败退江西后，更将毛撤了职，赶出红军长达三年。毛在周执掌中共大权的时代是饱受打击，有志难伸。他痛恨那些洋大人，更恨那些“国际派”。周与他结怨很深。这种受排挤状态直到遵义会议才结束。毛利用长征途中军队及党内的不满，鼓动发难，要求中央检讨失败的原因，改组领导集团，接纳毛回来辅助周恩来领导红军。毛趁势反客为主，取周而代之，进而将周恩来排挤出红军。

第二个阶段：（1937年—1941年）由于得到苏俄支持与信任，长期担任中共领袖，加之在中共党内有雄厚的力量。周恩来并不甘心于眼前的失败。他等待时机，力图东山再起。抗战爆发后，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新的指示回来延安。这是周等待已久的机会，也是信号。旋即与王明结合，周在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上支持王明，拥护苏联的主张，也带动一大批追随者，改变党内形势。“国共合作，拥蒋抗日”成为中共新的方针。由此拉开“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序幕。这是毛夺权力后遇到的真正的挑战，毛领教了王明与周恩来结合的威力。其实“王明路线”的实质还是周具体实施推动，王明传达的苏联的方针战略，是周恩来的力量借王明的旗号卷土重来与毛争夺党的领袖地位。这是周恩来的风格和策略，其它人在台前发号施令，呼风唤雨。他则隐身幕后，执掌大权，控制一切。李立三时期他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瞿秋白时期，王明时期他是党的领袖。可以想象，假如“第二次王明路线”取得成功，毛被斗到或被莫斯科撤职。王与周的联合可能还会是这种形式：王明当总书记或主席，周当副主席，控制军队和党。由于形势变化，日本占领武汉，拥护蒋联合抗战无疾而终。长江局撤消，成立重庆南方局。莫斯科承认毛的领袖地位。“第二次王明路线”落幕。周和王明挑战失败。但周恩来仍然借莫斯科的支持和项英的新四军的支持，与毛周旋。直到“皖南事变”时，毛泽东用“借刀杀人”之计解决项英。使周顿失依靠，终于缴械投降。为两年后搞延安整风，彻底清算王明和周恩来铺平道路。试想如果有项英的军队在，以周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毛是不会轻易地在延安对周大张挞伐的。

第三个阶段：（1943年—1976年）中共的事业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是又一场“农民造反”，要想颠覆中国，毛这样的农民领袖是必不可少的。他比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周恩来都厉害。他老奸巨滑，深谋远虑，无法无天，不择手段。这些人是自愧不如。况且“形势比人强”，在与毛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周屡战屡败，阵地被一块块蚕食掉，苏联的表态支持毛使他惊醒。他知道大势已去，他无力与毛争雄。中共领袖的位置非毛末属。他痛下决心，转换角色来适应新的形势。以副手的身份辅助毛夺取江山。他的选择虽然无奈和屈辱，却充满智能与远见卓识，威力十足。毛周的结合影响深远，已为历史所证明。从此以后，周就是毛泽东的参谋长、外交官、警卫员、谋士、仆从、宰相、战友、同志、说客、帮凶。毛的需要就是他的工作。所有这些角色的背后他们俩的对手关系没有真正改变。毛始终限制和约束周，一有机会就要打倒他。周则时刻警惕，小心周旋，立于不败。俩人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直到最后。只有在国共内战期间毛对周比较“友好”。解放以后毛又重新开始斗争。1953—1954年“高饶”是毛放高岗要打周批刘，被刘周联合挫败。1958年毛亲自上阵批周“反冒进”要逼他辞职。周坚持下来得以幸存。1966年文革爆发，扫除“刘邓彭罗”以后毛又要倒周，双方在1967年激烈较量，毛以失败告终，周成为党内保守派的总代表。1971年“林彪事件”是毛再遭重创。1973—1976年毛再度奋起打周，可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槽缟。1976年一命归西，周的追随者打倒文革派，否定文革。毛与周的斗争从二十年代末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俩人死了已后。“四人帮”垮台和邓小平复出也他们斗争的延续，是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司马璐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是贯穿中共历史的一条主线。不谈他们俩人的斗争，研究不好中共党史和人物。

下面是毛的几段话，引自《晚年周恩来》和《汪东兴回忆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1966年3月份18日毛主席接见某国共党代表团时说“十年内战期间，三次赶出红军，十几次意见不能通过，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周不是不反，是时机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乏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他（周）现在是卖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政治局其它同志都参加。”

言为心声。这些毛在不同场合，对亲近或信任的人所说的话，是不加掩饰的，是真情的流露，是可信的。从中可以可看出毛对周的态度和俩人之间的真实的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 （二）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的帮助吗？

许多人认为毛离不了周的帮助。毛开展文革，弄得天下大乱。周有扶危定倾之力，能收拾残局。毛要依靠他维持国家稳定，靠激进派推动改革。不可否认周恩来有才华，有经验，能领导革命也能领导建设。他是最好的人选，但不是唯一的人选。中共内部人才济济，长期革命和建设积累了大量经验。应该说才能和经验不是周所独有。高岗、彭真、陈云、陶铸、邓小平都可以代替他当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也能当。华国锋、王洪文和张春桥也能当总理。即便是王洪文华国锋差一些，毛主席可以叫邓或者陈云出来辅佐他，给王当副总理，管工业管农业管铁路，谁又会拒绝毛泽东呐？况且毛一手遮天，全党都跟着他的指挥棒转，谁又有多少个人意志哪？在毛眼里周恩来所关注的不过是那些正点晚点、水库粮站或者交际接待之类的事，无关革命宏旨。谁都干得了，无甚希罕。如果说战争年代毛需要周，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想打倒周或者逼他下台，最后都没有成功。所以我认为不是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的辅佐。而是周拒绝下台，他千方百计地使毛不能把他推下去。他也千方百计地使自己变得对毛有价值。他位高权重，实力雄厚，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总是借用他的力量，或争取他的配合。《晚年周恩来》书中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以前和发动文革以前都向周交底争取他的配合。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没有周，毛垮不了，中国垮不了。

## （三）周恩来的相忍为党和保护革命晚节

《晚年周恩来》书中一再讲周卑躬屈膝，低声下气的伺候毛泽东。是因为周深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是克己奉君，是君为臣纲。这是曲解，作者是给周恩来涂脂抹粉，为他开脱。周没那么庸俗。

周出生于破落官僚家庭，受传统文化孔孟之道的熏陶。但他更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彻底地反传统的战士。为了他的理想和主义，所有的传统，道德，人情和伦理都不过是一件外衣。他可以随时披上这件外衣，也会毫不犹豫地弃之如鄙履。什么克己奉君或大臣的本分对他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是没多少约束力的。他更不会为出身的“原罪”而忏悔。他身上所

有的一切都是使其成为周恩来的原因。他也不会为曾经斗争过毛而后悔。如果要后悔，恐怕会后悔当初太调和，太折衷了。

周恩来的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是他的一种姿态。是与毛共处的姿态。是他在险恶政治环境中生存的方式。是表演，表演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与顺从。给毛看，也给全党看。他象造势，为争取全党中央的同情与认可。一是让横行霸道的毛泽东对他难以下手。二是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党内有人出来帮他。周恩来的忠君、隐忍和谦卑都只是表面姿态。他的内心并不妥协。他将这种“忠诚”强加给毛，毛自然不接受。毛泽东有他的原则，不会让步。但的确给毛搞阴谋增加了难度。假如周真象《晚年周恩来》书中所讲对毛忠心耿耿，步步紧跟。毛对他也不会如此憎恨和激忿，在他死后说出那样的话来。这是《晚年周恩来》之类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

周时常说的一句话是相忍为党，以此勉励自己也勉励别人。他的相忍为党其实就是为他自己。党就是他毕生为之奋斗而且成就辉煌的共产主义事业，他个人与这个党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他才是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毛泽东不过是个封建皇帝，只能代表他自己。周的名字是同中国共产党联在一起的。他要与这个党同进退，任谁也不能将他们分开。这是他“忍”的前提，这是他的最高原则。为了这个原则，他可以忍，可以反，可以牺牲，可以出卖，可以落井下石，也可以翻云覆雨。我是这样理解周恩来的相忍为党的。

许多人都要问为什么毛始终不肯放过周，要在晚年三番五次地发动运动，对这个忠心耿耿、卑躬屈膝、身患绝症的总理没完没了地死缠滥打。我以为这不仅是因为有历史恩怨，毛旧恨难忘，更有现实的利害冲突，周恩来与毛的治国理念不同。他内心不同意毛继续革命的想法。他不会心甘情愿的追随毛去搞这种天翻地覆、大破大立的变革。他不是毛的追随者和同路人。他却占据高位，受众人拥戴。他貌似谦恭，心怀叵测。他实际是想开倒车。这是毛绝不能容忍的。周恩来是他的敌人。与周妥协不仅是把旧账一笔勾销，承认他的地位。更是承认周及其党羽对未来中国的决定权。毛清楚他的继续革命的大业将要付之东流。周的追随者会清算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对毛泽东来说，文革末年的形势是生与死的抉择，是不进则退。他英雄一世，是无论如何也咽不这口气的。这是为什么毛不顾老迈年高，三番五次要奋起打周的原因。批林批孔，尊儒反法，批投降派，反击右倾反党风，不让周治病，最后把他整死掉。毛也拼尽全力，一命呜呼。

周恩来活得艰难也窝囊，很多时候他都是身处逆境，忍气吞声，战战兢兢。他的隐忍包含着高的智能和手段，包含着坚韧的生命力。他用一生来作这篇奋斗与幸存的大文章。无疑这是一篇传世之作。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可惜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是为了他自己，为他的党，没有一点儿是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

#### （四）林彪与周恩来

林彪是中共的军事天才，是“当代韩信”。他披坚执锐，攻城掠地，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册封为元帅。和平年代林彪和他的军队是毛泽东王位下一块基石；是他的近卫军；是他在党内斗争中取胜的法宝。大跃进破产以后毛被迫作了检讨，退到后边，让刘邓周来收拾残局。这些人苦干三年，把国家从灾难中救出来，从而赢得全党和全国的拥护，威望升高。毛则大权旁落；号令不灵；成了精神领袖。这使毛极为痛苦也决不认命的。他要东山再起夺回权力。他要准备用武力。他召唤林彪。林彪可能并不喜欢“放卫星”“万斤粮”之类的空想。但他也绝不会同意刘邓一伙架空老毛的举动。对林来说，毛的知遇之恩和他的天子门生的地位让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调兵勤王。这乾坤一掷不单击垮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为毛夺回大权。也打开了继续革命的大门，弄得天下大乱。更把林彪作为毛的帮凶放在中共统治集团的对立面上。这就是为什么林彪死后三十多年后仍得不到中共统治集团原谅的原因。

“九大”确立了林彪接班人地位和形成新的权力格局。文革激进派和林彪军人集团是毛泽东的文武双壁。文革秀才们本身没有实力，是全心全意拥护毛的继续革命的主张，是毛的代言人，有毛的力量作后盾，他们是文革的推手，是最活跃的因素。林是毛的棋子、工具和卫兵。是震慑反对派、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力量。是对周的平衡。但他不是毛的思想的传人。毛是瞩目张春桥和江青的。林彪恐怕只是过渡，为文革秀才鸣锣抬轿的地位。林彪不是受人摆布的人。他与文革集团地矛盾自然日益尖锐，他与毛是接班人之争。我想林彪在两个地方触犯毛泽东：一是他与文革派的接班人之争。二是他与周接近。如果说接班之争毛尚能折冲，后者则是犯了大忌。因为林周合流会让力量的天平完全倾斜。周恩来与林彪靠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需要。他们有共同的忧虑，都想让国家喘一口气，让人民修养生息，发展经济。他们都面临文革派的挤压。

林彪一直是毛的个人财产，是他的军事力量。谁也不能动林彪，谁也不能拉走他。毛曾经怒斥王明想拉拢林。周恩来是毛泽东始终约束和防范的对手。文革以来周的力量增加了，尤其是在军队的力量增加了。毛的设想是用林的接班人地位压住周，也用林彪的军事力量制约他。如果林彪与周恩来合流或靠拢，毛的安排就完全破局了。毛对军队的控制就很微弱了。一旦林或者周起来发难，毛主席没有太多反抗的力量。他的权位甚至安全都没有保障，有成孤家寡人的危险。这是他的噩梦。他绝不能让它成为现实。对这种前景他是十分警惕和随时防范的。这是真正触动他神经的地方。等到庐山上千夫怒斥张春桥的时候，毛看出形势危险：一是他的文革不得人心。在党内有大批反对的人。除林彪的党羽以外，汪东兴、陈毅、陈永贵、韩先楚、杨得志、许世友都攻击春桥（11）。二是林彪借“接班人之争”向他挑战。他是借打张来向毛示以颜色。毛对那些想要离他而去或背叛他的人是决不姑息的。他下定决心，挺身而出，反击林彪。而且不留余地地将林逼上绝路。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来挽回僵局，林彪也不会跟他决裂。林彪也一直想同他缓和关系（12）。他所以要把事情做绝，首先是流氓皇帝的性格决定的。其次也可看出他当时的困境与恐惧。林彪在，周能与之周旋，争取他。毛林终究是要分道扬镳的，对毛来说越晚越被动。周用心很深，五年后毛还要输。

林彪一死，毛是自断臂膀，政治上和力量上的损失都无可弥补。一败涂地。林彪集团的军事实力客观上对周是压力和威慑。没有林彪的存在，周恩来在军队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他眼看着毛泽东一步步自毁长城，走上了绝路。由于毛失掉了他的近卫军和杀手锏，再也不能故计重施（象66年那样）调兵进城来威胁他。他如释重负，百感交集，怎么能不哭哪？他和林彪从而1925年黄埔军校开始，是师生，是战友，是同志，最后也是敌人（周恐怕对林下了毒手）。感觉是很复杂的：欠疚、痛恨、惋惜、哀伤恐怕都有。长期压抑的情绪爆发出来，号啕大哭。他哭林彪，哭他为革命立下不世之功，最后横死大漠；也哭贺龙；哭项英；哭干女儿；哭那些在征途中倒下的战友；哭这个千百万人之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党；也哭他自己，千辛万苦才走到了今天。他不会哭经济或什么治国理念的不同。我们仍然不知道林彪事件的真相。他为何不去南方？他怎么死的？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出来告诉我们。

#### （五）揭开历史的帷幕看“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无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还是在中共内部都是一件大事。它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争夺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相互撞和挤压的结果。毛泽东借此铲除项英，在党内一统天下。蒋介石则消灭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也为苏北失利报了一箭之仇。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对“事变”真相多方掩盖，讳莫如深，使人民对这一历史不能客观地了解。弄清“皖南事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内部残酷的斗争；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是早期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从1925

年以后历任各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28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并勉他：“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13）。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为中共保留了火种。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14）。项英长期跟随周恩来，是中央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有共同的信念，都是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与捍卫者。在上海中央与毛的斗争中项英总是冲锋在前、毫不妥协。他于1931年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瑞金，撤了毛的职并取而代之。他就是毛常常提到的那些“钦差大臣”。项英和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是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斗争和怀柔，周是交替使用（15）。项英对毛的山大王式游击主义是坚决斗争，十分警惕。毛在国际派的打压之下大权旁落，有志难伸，岌岌可危。31年到35年是毛一生中最困难、最落魄的日子。这仇恨他铭记在心。项英和周恩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斡旋争取之下蒋同意将东南九省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东南各地的游击队只剩下几千残兵败将。蒋同意给它一个军，几乎两三万人的编制。显示蒋对中共的诚意，也是周恩来千方百计争取的结果。他亲自作蒋的工作，争取和说服他（16）；他让叶挺到淞沪前线见陈诚争取到陈的支持（17）；也让叶剑英和国防部谈判；让项英与第三战区谈判（18）；恐怕还有刘斐的贡献（他在国防部负责军令编列）。最后得到完美的结果——成立新四军。周目光高远，才能非凡。他使这支队伍借北伐铁军的英名浴火重生。这是他催生的婴儿，是他的杰作。周从一开始就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抗衡。此后新四军不断壮大，攻城掠地，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的山头之一。作为它的创建人和催生者，周恩来受益非浅，使他在失掉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东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叶挺是北伐名将，跟随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转战潮汕。周信任他，由叶领军蒋也放心，他是国共双方都接受的人（国民党不接受叶剑英，中共也不要国民党作军长），他是新四军的代表。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非项英莫属，这是由他的威望、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军队要控制在项的手里周才放心。这是他们的设计。

王明从苏联归来，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的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周恩来全力拥护，带动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支持新的“王明路线”（19）。中共党内没有真正的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由王明传达，周具体实施、推行的莫斯科的方针和政策。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但依靠的是周恩来的力量。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十二月会议以后，周与王明结成同盟，以武汉“长江局”为依托，与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项英对周恩来和王明紧紧跟随，他的东南局与新四军是周的有生力量。华北的朱德和彭德怀也向“长江局”靠拢，受到他们的影响（20）。使毛在党内落了下风，不得不忍气吞声，与之周旋。对毛来说这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直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意绪难平。动辄大骂“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毛骂的是周和项英这些人。项英和新四军成了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项英是周恩来的心腹，他只听周的话。新四军象是周的私人军队。武汉失陷标志着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要检讨失误与调整政策。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而毛显然是棋高一着，目光长远。在他的指挥下中共在整个华北、华中开辟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征粮，收钱，使中共的实力飞速增长。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才是那个能带领中共走向胜利的人，他是中共的领袖，赢得全党信服。1938年季米特洛夫的口信（21）是莫斯科对毛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是毛等待已久的加冕。毛巩固权力，号令天下，也开始打击反对派。他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1940年夏以调解叶项矛盾为名派饶漱石、曾山为东南局副书记参加东南局的工作，监视项英，了解其内幕，为未来作准备，是毛泽东的“掺沙子”。项及东南局仍受延安和南方局的双重领导。周

周恩来尽其所能地保护项英的地位，在他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22）。1940年三、四月间当项英在毛中央批评下要愤而辞职的时候，周则强调项英是东南局负责人，新四军有很大的成绩。六月叶项分裂，叶再次出走，周也是尽力调解矛盾，安抚叶挺，以免后院起火。他叫项英派袁国平亲自到重庆接叶挺并嘱咐他们（项英）要尊重军长。同时也再次强调东南局项英为主。周恩来为保新四军和项英用心良苦。他眼看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步步紧逼，新四军困守皖南，危机四伏。刘少奇陈毅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复争夺，四面出击，大打出手。打泰安，打车桥，打黄桥，打李明杨，打韩德勤，再打韩德勤。扩充了实力，也挑起了内战。黄桥战役以后，蒋调集汤恩伯、李仙洲、顾祝同、冷新准备消灭华中共军。国民党白、何于40年10月9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23）。11月19日毛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皓电”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抗日。但需放宽期限。同时中央书记处在11月25日电叶项：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未过江前由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名义。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40年11月中央内定撤消项英职务，东南局并入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因顾忌项英反对暂未出台（24）。这一系列的变化将项英和新四军逼入险境。他面前几乎全是死棋：留在云岭是不行了，新四军必须要过江，否则是违抗军令。不单国军要围攻他，在党内也是戴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胡立教的文章中说中央是同意项英用“拖”来对付蒋），前景黯淡；走却是置三军于险地。率领全军转移，大队人马没有根据地支持，没有友军掩护，长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北渡长江，极易遭到攻击。国民党能放过他，日本人也不会；即使安全到江北，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未来新四军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但这还不是一条死路，如项英率军北上，蒋未必会攻打他，逃过日本的截杀不是不可能。

毛和刘少奇都是运筹帷幄的高手，他们不会让项英脱网而逃的，他们要给项英布下一个不解的死局。1940年10月刘少奇拟定攻打曹甸的作战计划，要一鼓作气“迅速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25）。这是一个大仗，集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主力近十个团兵力（黄克诚和陈毅的部队）。（26）在中共官方记载中没有这场战斗，军史和将军的回忆录也鲜有提及。我从《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孙科佳）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书中说黄克诚对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担心在政治上不利。并说陈、粟给中央及刘、黄的电报中坚决反对，“立即消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反攻之口实，在政治上不利”（27）。

我想陈、粟担心的是韩德勤黄桥新败（1940年代10月1日），再打他，是师出无名。是挑起内战，破坏抗日。是亲痛仇快，是汉奸。政治上的被动尚可应付。在军事上有更严重后果。这才陈毅、粟裕最害怕的。云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他们再打韩德勤，报复的铁拳就要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但这正是“胡服计划”和毛泽东的目的。刘将计划报请延安，毛于12月初批准（时间不知）。对华中和延安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曹甸一口吃掉韩德勤，项英他们是并不知情的，他们恐怕只知道苏北要再打韩。从以下电文可以看出：11月份27日项问延安“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28）。11月30日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庆间开个口子，以便隔开“韩霍”（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韩霍”会叫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从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抓紧分批过河，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晚”（29）。在开战前一天毛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误导，麻痹项英。1940年12月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国民党怒不可扼，蒋介石下令反击（12月9日），用武力解决项英。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云岭。再发“齐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过江。

毛泽东和蒋给皖南新四军八千将士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项英是插翅难逃。项英在12月28日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撤退路线。会上争论激烈。项英决定新年以后开拔，也向延安发报，

不知他是否告知详情。是否告诉延安（项应完全明白毛和刘的用心）或走什么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因为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参与机密，随军行动。他会将所知的一切报告华中和延安（我猜饶身边还有一组人，他们有秘密电台与华中联络或派人传出消息）。延安或华中会将情报泄漏给国民党（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此外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台湾《传记文学》都谈到他的事。他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领命投奔延安，在抗大学习，罗瑞卿赏识其才华，后推荐给毛泽东，管过毛的收发。以后派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在皖南事变中他为国民党立了大功。后来在台湾当调查局长。从上面看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日本人也应该知道。1941年1月3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脱险，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

皖南事变有太多未解之谜：项英为何中途脱离部队？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的行动不符合常理。而且李一氓也同他在一起。可能是临危动摇或者感觉到内部的威胁。而且他的死也是个谜。都说刘厚重见财起意，我怀疑他是受人指使。刘去过延安受训，可能是领命而回。成为延安在新四军里的“细胞”。项英有错误和战略上的失策。但都不是新四军覆亡的原因。新四军是亡在毛泽东手里，即使项英冲破上官云相的包围，也冲不过长江上日本人的截杀，毛还会“调来”日本人。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30）。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司马璐讲这是周恩来对毛的强烈抗议。毛的卑劣与险恶在“皖南事变”中暴露无遗。“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影响，毛藉此除掉项英这个劲敌。也使周失去赖以支持的军队，在与毛的较量中完全落了下风。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条件。延安整风是他俩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是前十八年关系的终结，也是后三十三年关系的开端。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到最后。

#### （六）贺龙事件的真相

中共官方公布的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书中说贺龙是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死的。这也是官方的统一口径。各种传媒、书籍都附和这种说法。这是林彪的罪状之一。林彪恨贺龙与罗瑞卿，毛为了拉拢林为其冲锋陷阵就做交易，牺牲贺龙。毛也到处讲他上了林彪的当，贺龙被林彪整死了。一副无辜受蒙蔽的样子。毛是阴谋家，满口谎言。他不昏庸，不受蒙蔽。假如贺是无辜的，忠于他，对他没有威胁。毛不会牺牲贺，拿他作交易来满足林彪。林也提不出这种无理要求。这不是毛泽东。毛做事有原则；要理由；要证据；他明察秋毫。

贺龙与林彪的历史地位都不能被对方取代。他们俩即使有矛盾，恐怕也是瑜亮情结，意气之争吧。应该说不会有什么解不了的深仇大恨。恐怕贺在刘邓集团里陷得深，有心反毛。这是毛林打倒他的真正原因。

贺龙是湘西袍哥出身，土匪头子。加入国民党军队后当师长、军长。他胸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不甘心于当军阀。在受共产党的影响（周逸群）后，他思想逐渐左倾，认同苏联式的暴力革命。1927年贺龙追随周恩来发动南昌起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贺身上有很深的土匪流氓习惯：重义气，胆大妄为，不敬鬼神。加之其人无文化，无马列主义知识，无共产党员的修养。不是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是那种“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入党”的人。与大多数的中共领导人不同，贺不是领袖驯服的工具，不是毛的奴仆，诚然他也惧怕毛的帝王权威和翻云覆雨的手段，但不是彻底投降。没多少真心实意的崇拜。他与周关系紧密。周恩来是贺的恩师和革命引路人。贺龙是周的死党。为了周和他个人利益，贺是敢挺而走险的（我的猜想）。贺龙在1927年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敢不顾一切放手一搏。他有胆识，让人不能小看他。毛对贺龙这种人是了解很深，猜忌很深，多加防范的。直到49年才让他带18兵团入川。随即在55年又把他调离军队管体育去了。



文革前贺龙管军委日常工作，和罗总长都是支持刘邓中央的。他们乐见得毛被取代的。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纠合在一起，陷得很深的。等毛突然出手拿掉罗瑞卿，他们感觉到毛林磨刀霍霍，凶相毕露了。所以也作相应的措施，准备对抗。传闻66年初贺龙利用军委副主席权力调一个团到京郊海淀，住在大学里阴谋造反。这就是所谓“二月兵变”。连同贺的其它“罪状”如给体委发枪发电台，在什刹海架炮。我想不全是空穴来风。一个团人马从海淀杀奔中南海只要半小时，中央警卫团恐怕打不败它，需要卫戍区上阵才行。这个动作可能是一个姿态，警告老毛。虽然不一定有实际意义，在中共党内却是破天荒地举动。贺在京畿重地悍然动兵，终于漏出狰狞面目。是大逆不道。毛对贺龙这种土匪，不敬鬼神，无法无天恨透了，必欲除之而后快。

周恩来与刘邓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在毛与刘邓的冲突中他愿意毛被架空或取代。但他不会反毛或者与毛冲突。他知道毛的力量和手段。他不信毛会善罢干休。他也要记取历史的教训。与双方都保持距离。是周恩来惯有的超然的姿态，保留回旋的余地。他永远不败。但是周可能任由贺龙与刘邓纠合在一起，同毛叫板。贺是他在刘邓集团里的代表，是他实质上的参与，是双方联系的纽带，象入股。毛打贺有几个目的。其一：剪除贺龙、罗瑞卿，刘少奇失去军人的支持，末日不远。其二：贺是周与刘两个集团的联系，打断它，是对周严厉警告。让周知难而退，弃刘邓于不顾。第三：贺一倒，周失去一条臂膀，元气大伤。在与毛的斗争中先输一阵。让周只有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周虽然极力保贺（66年春夏贺龙到西南各地视查“三线”和战备显然是想避开北京的风暴，可为时已晚），但贺龙头上带着反毛的铁帽子，毛是不会放过他的。周只能咽下苦果，牺牲贺龙。文革中动刀动兵的事都与贺龙有关，不知为何他并未被打入刘邓集团或彭罗陆杨里边。直到1967年才锒铛入狱。恐怕毛不想一开始打击面太大，要维持与周的关系，先对付刘少奇。等到毛大获全胜，矛头直指周恩来的时候。贺龙的问题自然就端出来了。

我以为贺龙与林彪没有不共戴天之仇，林是代毛打他。是毛与他有仇，他反毛。他是周的死党，是敢为周两肋插刀的人，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 （七）毛泽东，周恩来和苏联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在苏联引导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中共是苏俄孵化的蛋。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苏联对中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凡是莫斯科赏识信任的人就能在中共党内平步青云，执掌大权。反之则要被撤职或遭整肃。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盖莫能外。只是毛这种流氓皇帝连共产国际也奈何他不得，一再受打击，却决不认命，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纠缠到底。假如一定要整倒他，这个党可能会中途夭折或中共与国际分道扬镳。况且毛泽东与王明博古有什么不同？只要能维护苏联的利益就行。司马璐在他的文章中说苏联对中共领袖的支持是很功利，很现实的（31）。这有点儿“白猫黑猫”的意思。毛有谋略，有才华。他能运动农民，颠覆社会；他已经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了；毛能保卫苏联，也听指挥。苏俄当然顺水推舟，支持他作“一哥”。可是也不愿他在党内一统天下，知道他与苏联恩怨极深，早晚有反目成仇，清算旧账的一天。就要在中共内部有能平衡他的力量。

周恩来是苏联一直信任和赏识的，长期担当中共领袖，实力雄厚，对莫斯科是全力拥护。是苏俄在中共的代理人。周与苏联的关系深，也维持最久。他领导中共是苏联一手安排的结果。虽然毛取而代之，但周仍是党内最大的实力派，是党内平衡毛的最理想的人选。苏联和周是相互支持的。苏联可以妥协，承认毛的中共领袖地位，也可以默认他打周。但是，莫斯科决不能容忍他把周恩来彻底打倒。这就是为什么43年季米特洛夫要发电报。在周恩来王明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就是毛泽东和苏联的关系，就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毛在党内受教条主义的气，受经验主义的气。背后莫不是苏俄在作怪。毛象孙悟空被套上紧箍咒。

毛几十年如一日地对周打击和清算，以及斯大林死后与苏联反复纠缠，无理取闹，直至分道扬镳。都是出于同一心结。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同他与苏联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周恩来身上一直有莫斯科的影子。

苏联对中共的控制早期最紧。因为中共是苏联一手扶持。有国际派（周以及王明等都是国际派）掌权，一切都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中。毛夺权以后在党内经几个回合的较量，打败了国际派的反扑。进而在延安整风中清算王明与周恩来。很大程度上洗去中共的俄化气质（32）。俄国与中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对毛这种枭雄也不得不小心应付，假装恭敬。但是由于客观形势和力量的原因，毛的中共要革命胜利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所以苏联对毛仍然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我个人观点）。在中共历史上每当关键时候都有苏联的身影显出来，决定中共的大方向：1936年长征中的张国焘与毛的斗争（33）；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34）；37年中共方针的转变，拥蒋抗日（35）；38年季米特洛夫承认毛领袖地位的口信；41年毛的“派十五万人到国统区大打内战”的计划被苏联否决（36）；1943年十二月季氏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使延安整风停下来（37）。1953年斯大林死后两党关系在真正质变。斯大林的权威和恩德象压在毛头上的大山，象紧箍咒。斯一死毛象孙悟空被解放出来，要大闹天宫，报德报怨。从58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与苏联争雄的意思已经露出来了。53年以后毛对周的斗争达到一个高潮：55年“高饶集团”，58年批判“反冒进”以及“潘汉年事件”，“广东反对地方主义”（38）。不可否认，建国后毛发动政治运动很多都是由于路线分歧，主义之争而引发的。但权力斗争，个人恩怨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在刘少奇康生彭真等人的帮助下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清算以往党的“错误路线”，打击苏联的代理人，树立起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到43年王明已经彻底失势，健康恶化。他们将斗争矛头直指周恩来。周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一方面作检讨，一方面全力维护斯大林和莫斯科的领导（39）。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给毛发电报劝阻他在党内批斗周恩来和王明，也指责康生（40）。毛于44年1月2日回电表态，拥护和推行联蒋抗日的方针，拥护斯大林和苏联；团结周恩来，继续批判王明，也为康生辩护。毛的回电是深思熟虑的。他拥护苏联和斯大林，维护苏联的利益（拥蒋抗战），而苏联承认他的地位。这是双方交换，都是不会触动的；周恩来长期以来是苏联在中共的代表，在党内树大根深，保周是莫斯科的底线。而在不得已情况下王明可以被牺牲。毛对此看得清楚也就区别对待。况且国际派已经四分五裂，周也俯首称臣。他已经达到目的。他还想用周的才华。毛恐怕一开始也没把握能打倒周。他要看苏联的态度。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实际是代表斯大林对他的态度，是对他的警告。毛是不能违抗的。也就顺水推舟，结束运动。我从毛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延安整风发起的背景是苏联与德国在莫斯科（41年）和斯大林格勒（42年）生死搏杀，斯大林内心惶恐，自顾不暇。他只关注日本“南下”或“北上”，只要蒋坚持抗战拖住日本就行。毛泽东周恩来的事他是没兴趣的。到1943年夏天，德军从库尔斯克败退，红军完全控制住战场形势，胜利在望了。中共的问题又摆上斯大林的日程。而此时毛对王明周恩来步步紧逼，要赶尽杀绝的架式也让斯大林不能不出手。苏联对中共内部斗争了若指掌。苏俄在延安有红军情报组同党和中共情报机关广泛联系（41）。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密电就是通过红军的情报官传送的。况且周恩来在重庆与苏联外交和情报人员有密切的联系（42）。

有一个问题一直被人忽略：为什么康生在延安整风以后就“消声匿迹”了？在国共内战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也弃之不用？而同样跳得很凶的刘少奇彭真却一路高升？这是耐人寻味的。我以为这也是毛对苏联的退让与妥协。季米特洛夫电报中我们能看见答案，他指责康生。而且说的话很重“我不怀疑康生是在以他自己的行动为这些奸细（国民党）助一臂之力（43）。这些话是苏联、斯大林对康生的态度，很专横，毫无商量的意思。因为康生背叛王明，投靠毛泽东，帮他罗织罪名，打击异己，伤害了苏联的利益。苏联不容他！虽然毛表面上仍为康生辩护，但

他决不会冒与莫斯科冲突的危险来保康生。延安整风一结束康生即离开了权力中心，去领导地方土改，随后外放山东。直到59年才东山再起。我以为莫斯科的（1943年12月22日）电报是决定康生命运的关键。他坚决反修恐怕与此有关。

#### （八）周恩来能幸存的原因

1967年在毛泽东的帝王生涯中，在中共党内斗争中都是重要的一年。它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从此毛开始走下坡路，最后一败涂地。

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这以前毛泽东打倒刘邓及彭罗陆杨，一路凯歌高奏，随心所欲。1967年开始毛一再遭到挫败，众叛亲离，日末途穷。死后保守派全面复辟否定了文革。1967年的斗争决定了以后9年中国的政治形势，稳定了周恩来的地位，稳定了毛与周的关系。为文革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谈毛在打垮刘邓陶以后之所以要继续革命将运动深入和扩大，是要彻底扫除刘邓的权力基础，防止这些人复辟。但在全面夺权以后毛并未郢旗息鼓，而是乘胜追击，将火烧向国务院，烧向军队，烧向在中央坐阵的周恩来。周恩来和军队从来都不是刘少奇、彭真的权力基础。只能说打击周和军队是毛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因为周与中共军队是紧密相联的，所以毛的计划中，倒周和整肃军队是为了一个目的。

毛让中央文革操纵造反派“砸烂国务院”，夺余秋里的权，夺李先念的权，夺外交部陈毅的权，拆周的阵脚；与此同时，5月间放出“5.16”兵团，成为专门攻击周恩来的尖兵；毛的杀手锏是掀开“伍豪事件”，给周恩来套上绞索，要终结他的政治生命。中共官方和《晚年周恩来》都说这是国民党的阴谋，被“四人帮”利用来污蔑周。因为周在“顾顺章叛变”后根本就没被捕过，谈不上“脱党”。这些都是中共官方故意混淆和掩盖。我想这件事本身不是很简单。问题的症结在于时间。周在1931年没有被捕，但在1927年“4.12”以后被国民党抓住过，后来放出来，是否变节，不得而知，当时顾顺章在他身边。张冲等人炮制“伍豪启事”恐怕并非是指1931年，而是旧事重提，指1927年他被北伐军抓捕的事。常理判断，被捕脱党。这是周的“硬伤”，回避不了。吴洪森在他的《揭开周恩来之谜》里说周自称是白崇禧的弟弟闻讯赶来，放了他这个老师。吴基民《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说是北伐军师长斯烈是他黄埔学生，其弟斯励也是共产党，所以放了他。艾蓓的《叫父亲太沉重》里也说“伍豪事件”是他们借27年周的被捕来作文章。“倒周”是非同小可的事，毛会极慎重，用过硬的证据。不会任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周的“叛徒故事”，这样也打不倒他。所以周对这件事极为重视：反复核对，再三声明，签字画押，临进手术室以前还大喊“我不是叛徒”（44）。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是这件事情本身的杀伤力。二是他被毛抓住了把柄。

我再回到1967年的主题，一月夺权及军管以后。全中国都控制在军队的手里。军内外造反派开始冲击各地军队，要打倒不听毛的号令的军头。军队毫不客气在中央军委（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恐怕有林彪的支持）怂恿之下，假借圣旨在全国大肆镇压造反派，抓人杀人，显示武力（45）。毛急忙赶来把老师们打成“二月逆流”。并且警告军人，号召军队支持“左派”。军队却混淆敌我，扶持保皇势力，打击造反派，与毛抗衡。入夏以后，毛离开北京，云游四方。他要亲自出马，压制各地的军头，也遥控北京，让他们放手打周。造反派铺天盖地昼夜包围中南海，包围大会堂，要批判刘少奇，批判陈毅，向周施加压力（46）。“5.16”兵团四处煽风点火，揭露周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以及反毛的历史（47）。中央文革甚至传话说这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抓党内的柯西京”（48），矛头直指周恩来。“伍豪事件”也在党内酝酿发酵。周面临其政治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一旦时机成熟，毛及文革派就会点他名，将他抛出来，打翻在地，万劫不复。他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与之周旋。斯诺的谈话说周告诉他军队进城杀造反派的事。不知是几月发生的？这是重要信号：军队要保

卫他这个总理。7月20日武汉陈再道发动武装游行，向毛示威。南京许世友也跑进大别山作“割据”姿态。毛见势不妙，仓惶逃往上海。这是对毛一次大的打击。目前没有资料显示周就是武汉“7·20”和军人反弹的幕后操纵者。但是这些实力军人和周是唇亡齿寒的。毛看到军队对周的支持。决心铤而走险，清洗军队里周的势力。8月7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地掌握住枪杆子》，号召揪“军内一小撮”“抓带枪的刘邓路线”“武装左派”。在全国向保守派军头发起了挑战。周恩来身后的军队与忠于毛林的军队开始赤膊上阵，兵戎相见。全面内战一触即发。8月23日，造反派继外交部夺权后又火烧英国代办处，砸了苏联大使馆，引起外交纠纷。周眼见时机成熟，遂向毛“摊牌”。8月25日凌晨，他派杨成武带信给躲在上海的毛，现在已知的内容有“我最担心的是连锁反应，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之类的话。周手段极圆滑，他不逼迫毛，让形势教育毛，让形势逼他。他仍以忠臣姿态出面为主分忧，实际也是给毛的台阶下。他真正的角色是代表军队，代表反抗的军队同毛讲话，有摊牌的意思。也可以说他充当毛泽东与军队之间的调解人。毛不在乎那点儿“外交纠纷”，军队的态度是这背后的关键。毛面临严峻挑战。他清洗军队进而倒周的战略布署实行不了。那帮老帅及下面的军头都聚在周恩来的身后支持他。周也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抱成一团，人多势众，很难撼动。如一味蛮干，会导致分裂，全面内战。两军对垒，他没有取胜的把握。即使有林彪为他冲锋陷阵，对方也是多个山头 and 集团，力量占优势。他也不敢把宝压在一个人身上，何况林彪在1967年的态度还是个谜。我想他不会喜欢毛搞乱军队，打倒周恩来。他恐怕也干不了红军打红军的事儿。如果中央分裂，内战爆发，就是自乱阵脚，遗笑天下。毛毕生功业要毁于一旦。如果天下大乱，美苏也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介入任何一方，形势就复杂和棘手了。毛恐怕没料到，也绝对承担不起。他面临艰难的选择，实际上没有选择。只能知难而退，改弦更张。毛泽东在上海想了两天（8月24日午夜周同杨成武谈话，杨去见毛）（49），8月26日毛作决定，发出指示。他抛出王力、关锋、林杰；关闭《红旗》杂志；说他们都是“毒草”“坏人”“还我长城！”（50）。

毛泽东向周及身后的军人妥协。毛在党内横行霸道，走极端，耍流氓屡试不爽。这次却在他的那些土匪军头面前碰了大钉子，栽了大跟头。周和毛争夺的就是军队。周的根是扎在军队里的，而且很深。他的政府、国务院、外交、情报、政协和统战都可牺牲。因为这些都救不了他。文革后期他赖以生存的力量就是他在军队的实力。他紧紧抓住就是军队。毛千方百计打击的也是他的军队。67年是文革中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是毛（林）与周实力的碰撞，以毛失败而告终。直到死毛也没能扭转劣势。象吴洪森《揭开周恩来之谜》所说文革后期毛大牌出尽，只有文斗了。周及其党羽抓住军队。结果我们都看见的。毛决不象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可以为所欲为。他在党内受到制约。这个党是他的奴仆，也是他的敌人。他无法实现他的宏伟蓝图。毛所吟诵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慨叹他自己时运不济，壮志难酬。这是我理解的1967年文革，以及周在文革中幸存的原因。这以后的“抓5·16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都是毛向周和军队让步。让军队镇压造反派，屠杀人民，重树中共的恐怖统治（51）。也是毛周联手打压文革中人民日益觉醒的自我意识，和对共产党强烈的仇恨（52）（53）。“杨、傅、余事件”我不了解，应该还是毛林的反击。杨成武、傅崇碧跟周太紧。聂荣臻是周恩来的死党。“九大”也是妥协的产物。是力量的重新分配。不是文革的胜利。

毛泽东开天辟地，英雄一世，却斗不过周恩来。他损害了中共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把他们推向反面。这是他在党内众叛亲离，一败涂地的真正原因。毛是历史上的大暴君、空想家、改革者。他要改天换地，颠覆传统。在历史上这种人都是以失败收场的。毛也不例外。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代表中共内部最反动、最顽固、最保守的势力。伤害中国人民很深。

索引：

- 1，《周恩来其人》司马璐
- 2，《王明与王明路线》司马璐《张国焘回忆》张国焘

3, 《汪东兴回忆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4, 5, 6, 7, 8, 9, 10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  
11, 12 《尘劫》张宁  
13, 14 《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 孙科佳  
15 《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司马璐  
16 《周恩来评传》  
17 《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 孙科佳  
18 《周恩来评传》  
19, 20, 21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 孙科佳  
30, 《风雨四十年》童小鹏  
31, 《毛泽东与莫斯科》司马璐  
32,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  
33, 34, 35, 36, 37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华谱  
38, 《广东为什么要反对地方主义》朱建国  
39, 《毛泽东与莫斯科》司马璐  
4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  
41, 《美国间谍在中国》余茂春  
42, 43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华谱  
44, 《叫父亲太沉重》艾蓓  
45, 《文革中的首次血案—青海2, 23事件》丁抒  
46, 《外交部夺权前后的周恩来与陈毅》金戈  
47, 48 《首都5, 16红卫兵团的兴亡记》李晓航  
49, 《周恩来年谱》  
50, 《杨成武回忆》  
51, 《再论文革》杨小凯  
52, 《韦国清屠杀四二二派》  
53, 《湖南道县杀人事件》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 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